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与自由精神

□余一力

进入 20 世纪以来,随着文学批评的发展,传统意义上作品与评论之间的依附关系有了重要改变。文学批评不再是文学作品的附属产物,而是基于文学作品,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体系和限定域的文学现象。经历这样一个“批评的世纪”,文学批评的概念本身有了进一步深入:批评不再局限于作品内容和人物形象,而是挖掘作品所隐含的人类共同心理、语言范式、文化现象和政治权威。概念的深入也带来了文学批评限定域的拓展,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语言、宗教、性别等诸多方面都开始于文学批评领域显示它们各自的影响。但是文学批评所带来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文学批评能否在上述领域内保持它的有效性,体现出批评对于文本和文学现象整体、全面的阐释呢?

从实际状况而言,上述命题可能还只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假说。伴随着文学批评的发展,一方面它在自己的非假性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众多概念的加入和影响也制约了文学批评本身。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越来越多文学之外的概念加入,导致其往往偏离文学本真的初衷;许多文学批评徒有“文学”之名,远远超出文学之外。^[20]二是对世纪中期“泛政治化”文学批评,便是其困境的真实写照。二是文学批评概念本身的深入也衍生出了许多阻碍其有效性的因素,如语言范式、文化传播、受众心理等。在文学批评自主性不强时影响自然有限,然而在当今却无时无刻不对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产生干扰。可见,尽管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有了质的飞跃,其影响力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但它所受到的内外两方面的限制,似乎并没有减少。想要真正确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当务之急应是突破上述限制。而探索和建构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不失为很好的解决途径。关于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历史充满说纷纭,各执一词,恐怕最纯粹的本质论者也无法有根本性答案。既然如此,不妨换一种思路思考问题:在何种处境下我们与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呢?倘若我们能对此做出回答,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对背离文学批评之自由精神处境的某种超越,也许并不失为对探寻文学自由精神和实现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一种阶段性解释。

与文学批评自由精神相悖的处境,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活在话语的压迫中。话语,可以是代表政治与极权统治伴随的垄断话语,可以是经济利益将文学批评物化为某种商业手段,它同样可以是某些特殊经历(如从军、入狱、逃亡等)对文学批评者内心的影响。以至于当他们对作品进行文学批评时,代表这些影响的声言不由自主地跳出来与批评者激烈辩论,甚至压倒批评者的真实愿望。话语的压迫意味着某些话语模式对文学批评的统治。无论批评者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他们都无可避免使用固定的话语模式。在这种处境下,文学批评只能发出话语模式所允许的声音;因此,我们不难看到批评家们会对特定作品做出千篇一律的解读和评论。无论是古代解读《诗经》中“关雎鸠”时生搬硬套上的“后妃之德”,还是近代把英国湖畔诗派理解成“保守”、“反动”的象征,都是这种固守话语模式下批评家们开出的笑话。在这种众口同声的语境中,文学批评本身都成为这些话语的工具,丧失了对文本和文学现象做出阐释和评论的能力,所谓自由精神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了。

二是活在“历史”的童话里。国人很重历史,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是也。然而无论是祖祖辈辈口述的故事传奇,还是竹简帛纸的二十四史,它们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都是讲述者站在他的视角进行选择与记录的。历史的最大缺点在于:它总是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反复建构,而在这种重复之中,事件本身的真相及对于当代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则被选择性地忽略了。假如文学批评建立在讲述者的历史中,把建构当做理所当然的纪实,甚至是不证自明的公理,那么与历史联系紧密的文学批评就只能是对建构的一再重复。女权主

文化批评者早已明确指出,整部文学史其实是男性/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史,女性总是被书写、被制造和被叙述的。今天虽然已经逐步认可这一挑战“历史童话”的观点,但在国内学者对于神话的研究中,划分西方女神形象时还是想当然地按照历来如此的男性对女神的选择标准,把女神分为“天使”、“妖妇”两个大类。那些神话中的女英雄、女领袖、女勇士们,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埋没了历史的阴影之下。诸如此类的“想当然”、“习惯如此”的观念,在文学批评中比比皆是。所以,在“历史童话”中的文学批评,虽然不再是话语的工具但仍处在深层意识的意识束缚中,难以表达文学文本的全部特征和批评者的真实想法,因而不能被认为是代表了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

三是活人身份的圈套中。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身份的圈套日益成为文学批评的另一桩格。所谓身份的圈套,乃是批评者对于某种身份的认同,从而在文学批评中不自觉地作出符合身份和社交圈子的选择。每一个人似乎都生活在不同的身份之中,我们不由自主接受这些身份,除了身份本身可能的物质利益外,更重要的是想恋身份带来的认同感。尤其是在一个现代文明解构传统崇高的时代里,“我是谁”的问题困扰着世中的大多数,我们生活在物质的沃土和精神的不羁之中,自我存在感的极度匮乏让身份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安全标志。有了身份,才有了自我认识和自我价值的存在。因此,我们怎能不对身份趋之如鹜,不由自主地接受身份为我们规定的内容和方式。例如大学教授往往住对于流行于网络的通俗小说不屑一顾,而民间作家对于所谓格调、风雅也经常嗤之以鼻。在这种心态之下,文学批评也就顺其自然地陷入身份圈套中不可自拔。在圈套中,我们未必完全没有自由精神,但是它的

存在削弱了我们思考的能力和意识,限制了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全面性,让自由与真实永远隔着一层距离。

与文学批评自由精神相悖的三种处境,之所以被称为处境而不是“困境”,是因为我们既难以认识到自己受限于中,也无主动摆脱、寻求自由精神的能力。批评家在努力摆脱上述处境时,不可避免地遭遇话语压迫者的强大压力,甚至陷入主动失语的痛苦中;同时还要无时无刻和自己在已建构的历史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斗争,更要在打破身份圈套时敢于面对身份缺位的迷失。显然,交锋相对地直面这三种处境,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将成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即使能够承受,也无法保障出现反异化。因此,抗争和摆脱处境策略选择就极为重要:首先,文学批评家应当在逆境中培养思维和逻辑辨析能力。在已知的能够用逻辑确定定义的话语模式和历史童话中,文学批评家的第一要务是以自己的努力完善自身的逻辑性。当批评家单纯地服从话语压迫和历史童话,自由精神当然无法立足。但如若这种服从包含有由衷地从中蕴含的逻辑所折服,那么随着批评者逻辑演绎能力的进步与发展,终有一天批评者会发觉不是所有的话语模式和历史童话都可以合理推演——质疑自然开始,文学批评也将就此远离奴役之路。其次,在质疑发生时,文学批评需要以反讽而不是反对的态度面对这些自由精神的桎梏。还是以性别二元对立为例,单纯提倡“打破男权,绝对平等”,把男性作为斗争的对象,无益于对立的消解,还会招致持有不同观点的女性本身的误解和排斥;倘若摆脱桎梏的策略是在书写中改变男性在话语中的地位,以男性中心话语模式建构女性中心话语,在这种巨大的对比和反差

下,身份圈套的荒谬对于相当部分的读者而言不言自明,有助于更多的参与者不再自觉地踏入身份圈套的状态;这样,才能实现打破二元对立的第一步。

当然，并非摆脱这三种处境，文学批评自由精神就会如约而至。处境是否能被摆脱，逻辑和审美观是不是在建构新的桎梏，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摆脱的意义在于，文学批评者能够以更为有力、更少受到过往的历史和当下的环境影响的视点来看待我们已有的文学问题与现象，并为之可能出现在文学文本和文化生活中的类型情形提供有益的参照，这一参照与建构历史“童话”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它提供的是一个帮助全方位思考问题的体系和一种敢于怀疑、善于怀疑、怀疑之后解决问题的立场。后来者可以根据这种思想和立场重新建立与他们时代的价值观念相适应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不必受限于当下文学批评所运用的语言，拷问的历史观念和习惯的身份立场。同时，对于已有的结论，文学批评也可以借以来进行新的思考和认识。例如《简·爱》的后现代解读，便是打破惯例与模式的新成果。

必须认识到,“自由”本身并不直接走向有效。即使具备了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依然需要文学批评者为之付出心力。但是,追求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是摆脱外在因素对文学批评本身所造成的不易察觉之影响,实现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可能途径,而在这条道路上,文学批评会有所收获,也必然面临某种选择。就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走向了梦幻的美好与真实的欺骗并存的世界,不再依赖海尔茂而是勇敢地独自面对世界;而艾梨达却选择了放弃象征海和未知的陌生人,留在了格尔夫身边继续普通人的生活——她们共同秉承的信念便是“自由选择,自己负责”,亦可以成为文学批评者们所应遵循的准则。毕竟,无论是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还是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总不会原地不动就可以等待的吧。

如何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9)

文学需要飞翔

□石 厉

近期有人强调文学应贴近心灵与现实,关于题,中国古典文学中不用说,从西方现代主义、拉奥幻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都不会诞生在真空、会凭空想象,即使是历史文学、童话、寓言或科学样式,不管它们的情节多么离奇,也都呈现与现实的表现背景。不同的心灵背景和现实背景产生的文学形式都有不同,先秦有楚辞、汉有朝有骚文、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这也是人们所认为的一代皆有一代之文学的深层原因。心灵是现实、现实的土壤上产生的,但是成功的文学不会沉入到心灵与现实中止步不前,都会以诋毁或批判的方式,对自身所处的的心灵环境与现实进行独特的反思。因此面对心灵与现实,问题是,我们所贴近或反思的对象究竟是一个什么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灵与现实?因为创作者心灵也好、东西的心灵也好,心灵永远都是一样东西,谜有谜底,但是心灵却没有谜底认为上帝是心灵的谜底,但是自从“上帝死后,人们的心灵就像泛滥的河流,不仅随处后,而且四处奔流,你根本无法紧随其后,不给别人造成灾难,给自己也造成灾难。而现实乏为了物质利益而战天斗地的名利场。在这下,理论家感到一种压抑和苦闷,重中文学要灵、贴近现实,这种重中如果仍然让文学、让读者在心灵与现实的迷阵中无法自拔,那是义的。如果是试图要寻找让心灵透气的窗口找到像陶渊明《桃花源记》那样既入世又出尘,那是文学的幸运。能不能实现呢?我认为要限定,那就是在文学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在优秀作品中,完全可以实现,那些许许多多优秀而文学作品就是例证。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文学的学就是给人一种理想、给人一种继续寻找的力量一种永远的感动与冲动,不管格局如何,人们却弃,用哲学家尼采著名的概括来说,文学的精神“精神”在尼采的阐释中,“酒神精神”是悲剧精质,是人类伟大精神的见证。这种精神之所以伟大于它是对于复杂现实与人类狭隘心灵的一种超越观结局的一种超越。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的心灵越来越曲折,越来越复杂。文学中主体所面临的心灵与现实这个

今非昔比!这也是《黄帝内经》中黄帝与岐黄主出的人心与现实都不古的事实。人的心灵时代那样简单、朴素,现实也不是人们那样理想与纯净,心灵也可能是伪心灵,现实那种,或者说现实与心灵越来越不是自己所期待的那样。1844年《现实与心灵被扭曲》,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因而只靠事实的反映或贴近,文学也无法期待的文学。事实上任何一个由人群组成的,在一个理想的现实与理想的心灵:海涅在小诗《世界和人生太残缺不全》中直接叫喊“人生太残缺不全”,我要请教德国的教授去!凑人生的本领,“能搞出个明白易懂的体系!宇宙结构的窟窿,/用他的睡帽和破睡帽(译)这首诗歌反讽了教书匠对残缺不全的世故得意进行的掩饰,理性的虚假的掩饰!诗得舒婷曾在一首诗歌中写道:“我要求天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舒婷的这首诗歌曾心受到过震撼。在舒婷富有象征含义的语:要求天路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那是由于天路、道路可能不正直。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将现代社会的人类类，他就像蚂蚁一样被本能的欲望控制着，穷的物质利益所驱使，这就是人类真实的，他认为人类理想的心灵则是超越物质利益层面的，是对于自由的向往。他的小说《罪与罚》等，其中主人公所有的行为与心这样一条心灵悖论式的存在而展开。在《桑》一文中指出：“她的信念、希望和理想，道德感、他人的精神需求，人类对于完善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蚂蚁的欲望上。……即承人的自由（因此也承认个人的责任）。由此并及对于履行义务所需要的严格的道德上的，完全承认个人的责任。”这既是在谈论乔治也是在谈论他自己的小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受物质利益驱使的心灵本能，也就有利益的纷繁现实，心灵的责任就是要试图超本能驱使的心灵和在利益追逐中形成的人类的心灵建立一种信念和理想，这种信念是空泛的，是建立在道德与责任基础上的，是对于自由的追求。没有这样的理想，人空泛的、茫然的甚至是罪恶的，所以他笔下煎熬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由于利欲所致。利己罪恶的牢狱不得自由，幸福平静的内心是需要的欲望。而建立在道德、正义和他人幸福基础上，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才具有广

空间。

另外,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能动的参与者是作家这个主体。作家除了要描写心灵与现实这样一个客体外,随时还要反观主体自身,也就是说作为现实存在与心灵所在的主体,同时要反观或面对自己所在的现实与心灵。在这种反观中,常常会走样,正如古诗所吟诵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者在感知自己所在的现实与心灵时,由于主体本身对客体认知过程的绝对干扰,很可能使这样一个过程发生偏差,从而出现量子力学中所说的“测不准”现象。所谓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是指测量工具本身对测量对象的影响导致所有的测量结果都要发生偏差。而文学艺术中,作品的创造者即主体不是标准严谨的工具,主体的复杂与自身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使测不准的几率将远远超过现代物理学中工具对测量对象的测量。因而本来是试图对于心灵与现实的贴近,结果却因为主体本身的偏差,而最终无法贴近。不只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常常是差之百里,谬以千万里。这就是主体与客体发生背离的一种结局。

事实上,面对客体时,创作者从任何一个角度试图进行的非虚构描写都具有角度的限制,限制就意味着片面或无法窥测全体,无法达到感知中的通透。现实的迷雾在你试图贴近现实时常常会将你与现实一同笼罩,让你无法看清现实的真相,文学却要揭示这种真相,因此文学艺术鼓励作家要运用想象、虚构、象征等非现实的手法逼近心灵与现实,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目的也是为了超越角度的限制,为了弥补真实描写中无法填补的空缺,为了弄清真实描写中的迷惑。只有在对客体的想象和虚构中,主体才能够获得解放,才能够全方位地触摸到对象世界的全部,才能让文学超越大地的囚禁,飞越到自己的天空,才能让文学具有自己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要贴近心灵与现实,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是写实,写实反而会消解文学的意义。只有超越现实的对象,文学才有可能获得本质的真实。因而这又是一个悖论,文学离不开心灵与现实,但是又必须超越心灵与现实。

这种人类理想,而为了自由,或者的心理是些痛苦让人陷入超人本能的之上的自我的前景和

文学的创作者,仅贴近心灵与贴近现实的写作,还远远不够,只有在对心灵与现实的不断感知中,最终超越心灵本能的狭隘和局限,超越现实中的功利和障碍,人类才能凭借文学体会到更加自由理想的境界,主体才能够在对客体的感知中,最终获得精神自由与解放,文学才能够意义无限。不然,那种出自动物的利欲本能,虽然是写实但却是功利的、堕落的文学,呈现给人类的只能是心灵的无限深渊和现实的泥沼。

洞察

洞察



中山文学
图书出版

苦行

2012年第四期(总第一百)

一频道

胡适在南港……………王炳根 散
风雨南华寺……………陈世旭 远去
呼唤中国文化之“心”……杨 林 关东
深阅读 望夫 悼亡
彭学明倾情写就献给母亲的祭 望夫
文：找回我们的娘 劫劫
……………廖 翊 妈妈
泣血愧怍——读彭学明长篇散 随笔
文《娘》……………郝 雨 高校
读书记 读书记(四)……石舒清 欧阳
小 说 陌生人……………秋 阳 序与
车过台儿庄……董兆林 “取势
白拐杖……………许 艺 告诉
比邻而居……成 难
花开……………林悦子 黄河
玉观音……袁志学 亮点
太阳河之恋……熊景春 诗评

学

(十期)目录

故乡.....冯积岐

日记.....高维生

兼谈文学.....杨仲达

的三种说法.....盛文强

.....余成

爱.....潘国萍

章.....张景璐

品展·中南大学篇

权 梁红艳 岳俊丽等

“远 用事精微”

.....朱向前

人：隐在山河深处的史

地.....唐荣尧

坛

问题.....段崇轩

速随记.....张清华



百花沙

2012年第二期目

主 编 / 姚雪雪

百花洲编辑部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

阳明路310号

邮编：330008

电话：0791-8689500

868953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

CN36-1053 /

国内邮发代号：44-1

定价：15.00 元

长篇	在国
贼日子 (长篇小说)	莞均实现
.....谢宗玉	赞:东莞
猥琐天才 (长篇小说连载)	莞时报》
.....李师江	成为文
	费需求
虚构	文化新所
梦死 (短篇小说)	去图书馆
.....梅 驿	市图书馆
	里,许多
	教育、旅
立场	费支出,
我爱华盛顿.....陈应松	市的未开
	看到图
	服务要怎
重建	气”使这
千年吴城 (散文)	一个庞
.....舒建勋	精神文化
	活匮乏,
	护,要与
前世	共文化胜
亦曾疯狂乖乖女	
.....诸荣会	

市民是生活的幸福源

读者评论

图书馆、博物馆等建设指标上,东莞做到了全民覆盖……国家级媒体盛赞图书馆办得像米店一样多。(《东莞日报》1月11日)当市民和读者成为消费者和受益者之后,文化消费之门被激活和释放了,相信在这个城市将逐渐形成一种幸福观:东莞居民产生了一种幸福感:只要想看书就可以去,这是一个很惬意的去处。在这个“图书馆”连锁的城市有了文化的自觉,更多地考虑精神文化享受,娱乐、收藏、赏画、看戏等文化消费在东莞人生活中的渐渐提高。图书馆打开读者的视野,文化打开一个城市东莞公共服务体系的逐步完善就是“文化惠民”,在这个文化“硬”条件后,我们更要关注文化的“软”惠民,恰恰是软硬结合、良性循环,文化才能接地气,市民文化底气十足。在这些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在生存的压力下,我们少有条件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们的业余生活基本是睡觉和挂QQ,精神文化生活饥渴。对于这个群体,我们社会需要更多共享公共资源,帮助更多人融入东莞,平等乐享文化成果。

甘应鑫(广东)

以上为邮件方式发送,电子邮箱:zhangyong@163.com